

# 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 对外政策\*

张清敏 潘丽君

**【内容提要】** 人的认识过程经常受到认知能力有限、决策环境不确定以及信息过量等问题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经常借用类比从历史中寻找启发,帮助认知环境和制定政策。作者依据《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文献,对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类比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毛泽东运用类比的方式与西方领导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借助类比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援引的类比不仅具有宣示和说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分析形势、把握环境、形成政策的认知思维过程。类比的方式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可以揭示决策过程某些方面的细微特点,因而是研究认知和政策分析的有用工具。

**【关键词】** 认知心理学; 对外政策分析; 毛泽东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 张清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潘丽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 100871)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9550(2010)11- 0054- 19

---

\* 作者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本文旨在借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历史“类比”的概念和方法,分析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认知方式和特点以及其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联系。为此,文章首先简要介绍认知心理学中“类比”的概念,分析其在研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其次,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相关文献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在认识世界形势、形成对外政策看法过程所使用的历史类比。最后,对这些类比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联系予以粗浅的分析。

## 一 作为研究认知过程途径和工具的类比

在研究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人们常说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认识、评估、分析、理解或把握等是制定合理政策的关键和基础。实际上这些词都暗含了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即政策制定者是怎样认识所处的客观环境的。一般的国际关系或对外政策研究往往关注政策制定者对形势的判断或认识是什么,对政策形成过程中领导人认识形势、判断事件过程的研究和关注不多,而这一过程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认知视角关注和研究的中心和焦点。这个视角力图从研究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者对客观现实世界认知的过程(cognitive process)来把握他们是怎么认识世界、接受和处理信息,进而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

人的认知过程包括从知觉(perception)到记忆再到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语言表达、思想和想象形成等,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对来自环境中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而不必去关注所有信息。<sup>①</sup>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非死板、机械的,往往与其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斯布罗特(Sprout)夫妇在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时指出,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只有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sup>②</sup>他们把前者称为“心理环境”,将后者称为“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

人们认识环境的过程经常遇到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制约。从客观上讲,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和泛滥的时代,信息的过量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主观

<sup>①</sup> Martha Cottam,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4, p. 9.

<sup>②</sup>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1, 224.

上的制约突出表现为人的认知能力的严重不足。有限认知能力和无限信息之间的矛盾使人们的认知过程往往借助成长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特定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定式,这种定式被称为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它是人们“用于处理、弄清和理解复杂和不确定环境的最基本的工具”。<sup>①</sup>不同的认知图式或知识结构指导人们有选择地关注、选择和解释信息,或保持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即按照与原有信仰一致的方式去理解信息;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形成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将一个群体的一种特性毫无例外地看做是这个群体的任何人都有的特点。这种认知方式往往加固原有的敌视或友好态度,决定和支撑特定行为特点。<sup>②</sup>简单地说,认知的这些特点可以被概括为三个方面:(1)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2)个人有选择地处理信息;(3)人们常用走捷径或心理援助来处理决策问题。<sup>③</sup>

认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它的理解和把握相当困难。虽然研究者可以运用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追踪思想的脑波,但却不能透露里面的任何内容,可以借助观察思维和认知过程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因为语言不仅传递思想,而且还在其结构中带有思维如何工作的痕迹,语言因此也被称做“心灵的窗口”。如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遇到新的、不熟悉的环境和对外政策挑战的时候,他们往往借助以往的经验、信念或固有的图式寻求启发思维(heuristics),走捷径,以帮助认知环境。其中有两种走捷径的方式在对外政策的研究中最为常用:一是运用简单的异类比较或隐喻(metaphor),<sup>④</sup>二是采取简单的同类间类比(analogy)。本文主要探讨类比方法的运用。

历史是面镜子,从历史上学习可以说是政治人物的一种习惯。所谓类比,是指领导人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喜欢与自己亲身经历的或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和清楚的类似事件进行比较。这种思维的形式化表述为:“AX: BX = AY: BY”。即

<sup>①</sup> 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3

<sup>②</sup> 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pp. 125-127

<sup>③</sup> Charles A. Powell et al., “Opening the ‘Black Box’: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Optimal Choice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Charles F. Hermann, et al.,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 209

<sup>④</sup> Keith L. Shimka, “Metaphor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4, 1994, pp. 655-671; Keith L. Shimka, “Foreign Policy Metaphor: Falling ‘Dominoes’ and Drug ‘Wars’,” in Laura Neack, et al.,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NJ: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5, pp. 71-84; Richard Lau and Mark Schlesinger, “Policy Frame, Metaphorical Reasoning and Support for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2005, pp. 77-114.

如果事件 A 与事件 B 二者都具有 X 的属性,同时 A 又具备 Y 的属性,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 B 也具有 Y 的属性。通过对某些方面相同或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定,以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具有相似性。<sup>①</sup> 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 将这种思维模式概括为两个阶段的假设模式:“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sup>②</sup> 例如,1914 年欧洲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僵硬的外交和过激的行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人为灾难。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普遍不希望 1914 年夏天的事情重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等国对德国执行了过度缓和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发展成为绥靖政策,纵容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和教训引发其国内的反思,导致美国孤立主义力量的上升,美国国会连续通过四个中立法,阻止美国过多介入欧洲事务,从另一个方面也助长了欧洲的绥靖主义。<sup>③</sup>

绥靖主义的代名词“慕尼黑阴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经验,影响了二战后所有战争期间的重大决策。为了避免重蹈二战爆发前由于绥靖侵略而导致世界大战爆发的覆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了强硬的“遏制”战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将当时的形势比做二战爆发前夕的形势,美国总统杜鲁门错误地认为,“在我这一代,这种强者侵略弱者的情况并非首次发生……若对此无动于衷,任其发展,那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像同样的事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sup>④</sup> 这样的认识促使美国大规模地介入朝鲜战争。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有人警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如果美国军队进攻得太靠北,中国可能介入的时候,麦克阿瑟援引“慕尼黑阴谋”的类比说,如果美国军队在离鸭绿江很远的地方就停下来,那就等同于绥靖了中国人,就像二战前英国人绥靖德国一样。1956 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英国首相罗伯特·艾登 (Robert Eden) 用同样的历史类比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法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那将就像英、法纵容希特勒一样纵容纳赛尔。<sup>⑤</sup>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停火后,越共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行将推翻美国支持的越南南方政权,“慕尼黑阴谋”及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的历史再次影响

① David H. Fis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p. 243-259

②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Worl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26

③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

④ Harry Truman *Memoirs Vol. 2: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6, pp. 332-333

⑤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p. 4-5

了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决策。美国领导人特别是约翰逊多次将东南亚的形势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相比,将越南南方的吴庭艳政权比做 30 年代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 (Henry Lodge) 给华盛顿发电报分析说:“我觉得如果我们不介入,很可能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难道我们能像我们在慕尼黑那样纵容(侵略)吗?”<sup>①</sup>越南战争的经验又影响了随后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如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后,美国总统老布什再次援引“慕尼黑阴谋”的类比,为美国进行干预提供支持。<sup>②</sup>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借用“邪恶轴心”的类比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他借口九一一事件入侵阿富汗,再次使人们想起了越南战争,不少学者撰文比较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异同。

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复,历史类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人们一次次地从历史中学习,一次次地犯错误,同时从错误的历史中再学习。黑格尔曾经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都不从历史中学习 (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sup>③</sup>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 (Ernest R. May) 是最早对历史类比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指出,从历史中学习很重要,因为它对政策结果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他重点研究历史是怎样一次次地被错误地运用的。他指出,人们在援引历史先例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引用第一次想到的事例,运用类比的人很少认真地思考和分析类比的实用性,而没有问问从哪些方面看,这样的类比可能具有误导性。据此,他在此项研究的最后向决策者提出了如何更好地从历史中学习,避免重复历史错误的建议。<sup>④</sup>当然,历史上也不乏运用历史类比成功做出正确决策的事例。例如,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在面临空袭和封锁两个选择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不断援引两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形势以及欧洲所爆发的不少危机,特别是引用珍珠港事件的先例,指出不能重复像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样的事,因为它是不道德的。<sup>⑤</sup>这促使美国政府用外

<sup>①</sup>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p. 3, 176;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73, pp. 87–121.

<sup>②</sup>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p. 3, 176;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259–261.

<sup>③</sup>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79.

<sup>④</sup>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143–190.

<sup>⑤</sup>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xii.

交手段化解了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老布什政府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汲取越南战争的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政策,大规模介入,速战速决,从而避免了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

与类比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面临同样的形势,不同的人可能因为经历或其他方面的不同而援引不同类比来帮助理解形势,指导他们做出不同的决策或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也有用同样的历史事件去类比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前者如越南战争爆发前夕,对法国在中南半岛形势非常熟悉的副助理国务卿安迪·鲍尔 (Andy Ball) 不断援引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的先例,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但是主张美国介入的领导人则不断强调美国在越南的目的、当时的形势都与 1954 年法国在越南的形势完全不同。这部分人不断援引“慕尼黑阴谋”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经验说明美国介入的必要性,最终导致了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同样的情况是,1979 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以后,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这一危机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 (Cyrus R. Vance) 援引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奥格斯·华德 (August I. Ward) 被拘案以及 1968 年美朝之间爆发的普韦布洛 (Pueblo) 号事件的先例,主张使用和平手段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则援引以色列 1976 年在乌干达恩德培 (Entebbe) 事件中使用武力成功解救 100 多名以色列人质的先例,主张使用武力营救的方式解决伊朗人质事件。两种不同的主张不仅出于各自部门的官僚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两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普韦布洛事件和恩德培事件的解决。<sup>①</sup>

同样的历史事件也可能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靶域进行类比。对于西方政策制定者援引“慕尼黑阴谋”的类比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也曾经多次运用这一历史类比,来帮助人们理解形势。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毛泽东在 1939 年 9 月 1 日答《新华日报》记者问时指出:“英法纵容德意日侵略……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英法反动派的这种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

<sup>①</sup> David Patrick Houghton, “The Role of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Novel Foreign Policy Situ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No 4, 1996 pp 523-552.

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sup>①</sup>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还专门为中共中央提出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指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sup>②</sup>

最后,关于类比的作用,学界也有不同认识和观点。如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梅的前引著作出版后撰写评论说:“历史学家永远不能确信——政治家也不能确信——援引历史从多大程度上说只不过是一种使某个根据其他理由做出的决定听起来好听的方法。”<sup>③</sup>也就是说,历史类比只是为决策者宣传已定政策、说服公众的一种公关策略,而非影响决策的一个因素,他甚至将“忘记历史就将遭到历史的惩罚”反过来说成“只有那些对历史念念不忘的人才会注定遭到历史的惩罚”。<sup>④</sup>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梅、政治心理学家杰维斯等则强调类比对政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把这种作用概括称为“类比解释(analytical explanation)框架”。<sup>⑤</sup>这种历史类比的解释框架包括六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决策者判断和认识所面临的环境。第二,有助于决策者评估风险。第三,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处方”。第四,预测政策成功的机会与可能。第五,对决策结果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评估。第六,预防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sup>⑥</sup>他还以此为分析框架,分析“慕尼黑阴谋”、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等历史类比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决策的影响。

## 二 类比与毛泽东的认知类型

毛泽东既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一生青睐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读了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不仅研读,而且对其中的内容做详细批注,多则几百乃至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62-763页。

③ Arthur Schlesinger, “Review of ‘Lessons of the Past’ by Eamest Ma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1, No 2, 1974, p 444

④ Eam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79

⑤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p. 1-46

⑥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 22

千字,或褒扬,或慨叹,或商榷,或批驳,或引申发挥,或浮想联翩。从市面流行的多种毛泽东批注的二十四史中可以领略到毛泽东读史时的心境、飞跃的思绪和独到的史学观,也可以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方法看到毛泽东的认知方式和独特个性。<sup>①</sup>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的典故信手拈来,落笔成趣,借古喻今,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而且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这些类比的选择也影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判断,乃至他的决策结果。鉴于篇幅所限,本文选取《毛泽东外交文选》作为文本分析的依据,探讨毛泽东运用历史类比的特点及其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毛泽东外交文选》收录和选编了毛泽东自 1937年 7月至 1974年 5月期间关于外交方面的文章、讲话、谈话、批示、电报等,共 160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在特定时间、特定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因此堪称解读毛泽东外交政策的最佳文献。由于本文分析的是毛泽东的认知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此截取其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的相关文章。同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政策的影响,所选文本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 1949年内发表的文章。

在《毛泽东外交文选》所选的有限文章中,多处谈到或引用《论语》《孟子》《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西厢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如他用《三国演义》中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形容当时的形势,<sup>②</sup>用“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批评那些乐意获得美援的人,并将他们和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相比。<sup>③</sup>他引用孟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说明世界的多样性和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sup>④</sup>用《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说明新中国应该与美国斗的原因,<sup>⑤</sup>用逼上梁山来说明被压迫民族被迫革命的逻辑。<sup>⑥</sup>他用《雁荡山》里围城和守城两派的斗争说明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状况,<sup>⑦</sup>用《法门寺》里的贾桂来说明有些人在外国人面前奴颜成性,不能理直气壮。<sup>⑧</sup>此外,《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以及成吉思汗等人物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都被引用。毛泽东多次提到中国的历史名著或者其中

① 中央档案馆整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8年版)出版后,国内又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专著,从不同的侧重阐述毛泽东读史的著作,参见赵以武:《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景有权、迟力:《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24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10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67页。

⑤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94页。

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25页。

⑦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68页。

⑧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38、351页。



的人物,对于表达毛泽东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看法、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典故大多是毛泽东与外宾谈话中引用的,考虑到对方的理解程度,这些典故或类比往往是一带而过,属于独立、分散而非系统的类比。从对外政策的影响来看,只有那些反复使用且具有政策含义的类比才能反映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对政策的结果产生影响。正如邝云峰在谈论类比作用时所说的,“和那些只使用一次的类比相比,被长期反复使用的一套类比,在政策形成过程和思考阶段不可能被用于证明根据其他理由做出的政策决定是合理的”,它们对政策形成肯定产生重要的影响。<sup>①</sup>真正能够反映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判断并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是他反复使用的近代以来的历史。本文梳理文选,找出了其中援引最多且具有直接政策含义的历史类比,并分别按照所援引类比的出处(源域)、所论及主题(靶域)、根据类比得出的结论或政策、谈话的时间、收入《文选》的篇名和页码以及所使用历史类比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参见表 1。

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文选》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五个特点。第一,使用类比是毛泽东在认识世界、分析形势过程中经常借助的认识手段和工具。《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所使用的历史类比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在这 139 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而系统地使用了 14 种、累计近 30 次不同类型的近现代历史事件,类比说明当时的国际环境或他对特定事件的认识和看法。

第二,毛泽东使用类比的靶域特点,体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简言之,反帝、革命”的主题。<sup>②</sup>毛泽东援引历史类比要说明的政策靶域有三个:(1)战争与和平问题;(2)革命问题;(3)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革命)问题。这些基本上属于高级政治的安全领域,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国际形势的基本主题和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有关对外政策决策的研究表明,对高级政治领域的决策,决策环境往往对人的认知能力挑战最大,而且因为时间紧迫、决策可能造成的后果重要、决策需要的信息不充分,因此决策者寻求历史类比等心理援助成为认识环境、判断形势的有效

<sup>①</sup>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 16

<sup>②</sup>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 1949-200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 页。

表 1 《毛泽东外交文选》历史类比分布一览表

类比(源域)	所论及主题(靶域)	得出的结论或政策	时间、篇名、页码
俄国(十月)革命	革命胜利及巩固是否需要国际援助	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的革命)也需要国际援助	1949年 6月 30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第 94页
	中国革命的逻辑问题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一逻辑	1949年 8月 14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第 101页
	目前敌强我弱的国际形势	对我们有利,终将是东风压倒西风	1957年 11月 18日,《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第 298页
	以美国为首的强大帝国主义势力与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力量	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弱能战胜强	1960年 5月 3日,《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第 399页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1961年 1月 24日,《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第 458- 459页
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巩固该向谁寻求国际援助	不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国际援助要向苏联方向寻找	1949年 6月 30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第 95- 96页
	目前敌强我弱的国际形势,对谁有利	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终将是东风压倒西风	1957年 11月 18日,《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第 291- 298页
	以美国为首的强大帝国主义势力与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力量	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弱能战胜强	1960年 5月 3日,《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第 399页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1961年 1月 24日,《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第 458- 459页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第 535页

续表 1

类比(源域)	所论及主题(靶域)	得出的结论或政策	时间、篇名、页码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与和平问题;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战争对谁有利的问题	要努力争取和平,预防战争,但又无须惧怕战争,战争最终对侵略者不利,防御者会取得胜利	1954年10月23日,《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第169页
	美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及对待战争应持的态度	要努力阻止战争爆发,万一无法阻止,也不要怕	1955年4月29日,《美国可怕,又不可怕》,第206-207页
	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果对谁有利	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要打,如果打,结果是对西方国家不利	1955年5月26日,《和平为上》,第208-216页
	世界大战问题	共产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	1955年10月15日,《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第225页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反对,二不怕	1957年2月27日,《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团结问题》,第284-285页
朝鲜战争的谈判解决	台湾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可以尝试用谈判解决	1955年5月26日,《和平为上》,第210-211页
苏美建交	中美建交	不急于建交为好,中美总会建交,需要的时间会很长	1957年1月27日,《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第280页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经济封锁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1960年10月22日,《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第451页
朝鲜战争的谈判解决	台湾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可以尝试用谈判解决	1955年5月26日,《和平为上》,第210-211页
国内一些地区的和平解放	台湾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	1960年10月22日,《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第453页
苏伊士运河事件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7月9日,《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第535页

续表 1

类比(源域)	所论及主题(靶域)	得出的结论或政策	时间、篇名、页码
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第 535页
古巴反美斗争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第 535页
越南反法斗争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第 535页
美国通过战争从英国获得独立/印度通过和平方式从英国独立	日本反对美国的斗争方式	日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反美斗争方式,不管是和平或战争都有可能取得胜利	1960年 6月 21日,《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第 442- 443页
张伯伦、达拉第对德国的绥靖	西方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	中国准备好应对苏联对中国的入侵	1974年 5月 25日,《同希斯的谈话》,第 603页

助手。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自身安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构成威胁时,毛泽东以其多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求助于判断、归纳、分析、评价、解释乃至推理,自信地运用历史类比,从而制定相应外交政策。

第三,从毛泽东援引类比的靶源方面看,毛泽东反复使用的类比主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 14种是具有重要政策含义和启示意义的历史类比。如在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毛泽东使用最多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毛泽东最常使用的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两种类比各出现了五次。其中,毛泽东不断谈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类比,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论及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前途时,毛泽东更是同时使用多个历史类比,包括中国革命、苏伊士运河事件、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古巴反美斗争和越南反法斗争,所使用的类比是三类高频类比中最高的,达九次。这三种类型的类比占毛泽东系统使用的类比总数的 60%。

第四, 如果将毛泽东使用的类比和美国领导人在同一时期分析形势、制定政策过程中所经常使用的类比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对称性。即美国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错误地把共产主义比做“法西斯主义”, 将世界革命的任何新发展都当做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扩张的一部分, 因此美国领导人处处拿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绥靖主义进行错误的类比, 处处插手, 充当世界警察, 干涉各国的革命运动。而毛泽东使用的类比则恰好是将美国为首的西方干涉比做阻止和反对被压迫民族进行民族革命, 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动力量, 而且毛泽东所使用的类比使他坚信, 虽然帝国主义很猖狂, 革命的道路可能非常曲折, 但革命最终是要成功的, 前途是光明的。因此, 从中美双方决策者所使用的类比看, 中美早期对抗或冷战早期的主题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第五, 邝云峰和梅等对类比运用的研究揭示, 决策者在面临新的不确定形势的情况下选用类比一般有三个特点: (1) 近期发生和决策者所经历的; (2) 与决策者参与政治相关的; (3) 表面的相似性等。<sup>①</sup> 毛泽东多次援引的战争类比和革命类比都是近现代历史上刚刚发生的, 大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 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具有影响的事件。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了解的人都熟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他多次撰文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十月革命的精神感召下, 青年毛泽东开始借助阶级分析方法, 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并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 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 十月革命在毛泽东的认知中有着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的国际社会来说, 可谓影响至深,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毛泽东对一战记忆犹新, 通过抗日战争的炮火洗礼, 他对二战更是深有感触。而对于中国革命, 作为革命先驱的毛泽东更是有着切身体会, 故而对此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某种“情结”, 因此, 这三类历史类比在毛泽东谈话中不断得到援引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类比也反映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自己的革命经验对其认识形势、制定政策的影响。

### 三 毛泽东所使用的类比与中国的对外政策

关于决策者援引类比的作用有两种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类比只是领导人将自己根据其他原因制定的政策合法化、进行公共宣传的一种工具; 另一观点则认为类比提供

<sup>①</sup>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p. 213–215.

了解分析框架,有助于决策者判断环境,评估风险,提供“政策处方”,预测成功的可能性、评估政策的道德正当性以及预防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影响等。从毛泽东使用的类比看,两种作用都有。也就是说,毛泽东运用历史类比不仅是为了说明中国政策的合理性,使人们能够理解、接受和支持这些政策;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理解形势、制定政策的认知过程,影响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的主要对外政策或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态度,本文拟选取“一边倒”政策的形成以及毛泽东对战争的态度两个具体政策,探讨一下毛泽东所援引的类比作用。

### 政策一: 类比与“一边倒”政策

早在建国前夕的 1949年 6月 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和阐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的时候,也阐述了政策的依据,或者说他对形势的判断。他说:“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sup>①</sup>在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把“一边倒”政策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予以规定。“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决定,也是影响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重要政策。从毛泽东两次系统阐述“一边倒”政策的过程看,毛泽东借用类比的首要目的在于向那些当时国内存在的对执行这个政策具有怀疑态度的民主人士或其他人士说明新中国执行这个政策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一边倒”政策时,首先罗列了当时存在的对这一政策各种可能的指责,然后分别予以批驳和澄清。在这个过程中,他借用不同的历史类比说明了“一边倒”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七年后,他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人谈话时再次阐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可以说,毛泽东援引历史类比,两次系统阐述“一边倒”政策,具有明显的宣教和公共政策作用。

除了宣教功能外,毛泽东在宣布新政府将奉行“一边倒”政策时所运用的类比还反映了毛泽东的认知过程和思维过程,也解释了他思维逻辑中执行“一边倒”政策的原因。根据邝云峰的分析框架,类比的解释功能包括判断环境、评估风险、提供“政策处方”、预测成功的可能性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或已清楚的信息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严重对峙。从理论上说,新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对外战略来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即:第一,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第二,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第三,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清楚,美国也在“等待尘埃落定”,国际上不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93页。

知道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虽然联合美国不现实,但当时国内民主党派中确实存在着奉行中立政策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早早地宣布要“一边倒”呢?

毛泽东在当时和此后几个讲话或说明中所使用的几个类比为我们提供了揭示毛泽东为什么决定“一边倒”的思维发展过程。第一,毛泽东使用类比并从类比的选择中推断出尚不清楚的信息。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进行类比,将孙中山当时所经历的挫折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环境进行类比,他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经验和二十八年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第二,毛泽东还援引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做类比,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外援。“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的历史告诉毛泽东,没有国际援助,不仅革命不可胜利,而且“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新中国必须得到援助。第三,孙中山革命的经验再次告诉毛泽东从哪里能获得援助的问题。他用同样的类比指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到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sup>①</sup>他后来向怀疑“一边倒”政策的民主人士解释说:“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他们吃饱。”<sup>②</sup>原本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存在强烈对抗和敌意,而把苏联比做强大的“和平堡垒”的毛泽东,援引十月革命和孙中山革命斗争中取得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美、对苏的认知。这种思维过程是认知一致性的典型表现,经过这样的认知过程,毛泽东对两大阵营形成了黑和白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选择倒向苏联再正常不过了。

此外,还有一个类比,虽然毛泽东当时没有提出来,但也同样影响了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一边倒”,即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类比。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苏联人不相信中国,怀疑新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他后来曾明确地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sup>③</sup>由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当时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两大阵营之间奉行相对中立的政策,结果遭到了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95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78-279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52、260、323-324页。

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谴责和批判,在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严重孤立。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并不和谐,毛泽东知道苏联人不信任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有意将毛泽东看做是另一个铁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力图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来说,一旦不明确宣布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将面临着正当性的挑战,其政治后果也将是严重的,即不仅要面临着被毛泽东看做“野兽”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威胁,而且还得不到苏联的援助。

通过援引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南斯拉夫的类比,毛泽东不仅向怀疑者说明了新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的必要性,而且这些类比也帮助他获得了关于国际形势更多的信息,不仅给他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清晰的思路,而且向他提供了政策选择的导向,帮助他评估了不执行“一边倒”政策的道德正当性以及预测了不采取“一边倒”政策的可能代价,从认知的视角解释了新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的必要性。

#### 政策二: 类比与毛泽东对战争的态度

如前引文所述,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外交的主题是“反帝、革命”,这一主题与毛泽东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从客观上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紧张的两极对峙使战争的爆发随时都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无论在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中,还是在西方政策制定者的言论中都是经常谈及的现实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底会不会爆发以及如何对待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自然成为新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援引一战、二战的类比,说明他的态度不仅具有明显的政策宣示作用,也从认知角度解释了毛泽东对战争态度的逻辑和原因。

对世界大战能否避免的问题以及对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或策略问题,毛泽东从不乐观,多次有明确表态。如毛泽东在《关于世界大战和国际团结》一文中指出,一反对,二不怕。关于反对,应该不难理解。对于新生中国而言,百废待兴,要发展国民经济必然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又该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不怕”呢?首先,毛泽东对战争态度以及他把原子武器看做纸老虎的观点具有典型的毛泽东风格。国内一般都是从哲学或辩证的角度去解释说明其高明之处。但是这种看法使许多外国领导人困惑不解,为此毛泽东还“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sup>①</sup>他都是在与外国领导人谈话,或在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说明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和观点的:如 1954年 10月 23日与印度总理贾·尼赫鲁的谈话,1955年 4月 29日与英国共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97页。



产党主席波立特的谈话, 1955年5月26日同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 1955年10月15日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以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谈话和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他借用一战和二战的类比首先也是为了表明其观点是有道理的, 具有类比的第一个功能, 即证明政策合理的宣教功能。

但是, 两次世界大战的类比也有着强大的解释功能, 说明了毛泽东的思维过程和他对战争看法形成的逻辑和原因。毛泽东在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类比时, 通常会摆出下列事实: 战争是要造成重大损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五六年, 对战争双方都有物资和生命损失, 这表明世界大战会带来严重灾难。根据类比推理  $AX \rightarrow BX = AY \rightarrow BY$  的公式, 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具备世界大战的基本属性,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结果, 必然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带来的结果, 而且从前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对比看, 所导致的结果程度上具有明显的递增性, 因此推理所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合理结果为: 历史时间会更长, 破坏性会更大。由此, 采用反对也就成了合理选择。但是, 毛泽东为什么不怕呢? 甚至还说要打了以后再搞建设呢?

对于战争, 毛泽东不仅不怕, 甚至还抱有一种欢迎的态度。因为毛泽东从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是, 不是战争导致革命, 就是革命消灭战争。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类比或经验告诉毛泽东: “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以断定, 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 帝国主义剩下地盘就不多了, 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sup>①</sup>他的逻辑是, “要搞战争的话, 就要动员人民, 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 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 人民结合起来以后, 势必会产生革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机会才能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 那么十月革命就会有困难。我们在中国打了二十二年仗, 但是胜利还是在最后几年取得的。”<sup>②</sup>“例如, 中国革命就是这样, 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很难独立。”他援引二战经验说, 战争结束后“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 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 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 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 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 我们就站起来了”。“如果再要打仗的话, 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4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9-170页。

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共产党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这表明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这方更为不利些。因此,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不仅不怕战争,而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战争。

#### 四 结论

作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对外政策受到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如国际局势、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国内政治等。认知只是影响决策结果的一种因素,它不排除其他因素对一国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影响。对领导人认知过程的研究可以从微观解释对外政策细微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是其他视角所不能解释的。这也许正是认知视角的学术生命力所在。但是,由于这个学科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还不多,本文只是从研究认知的众多思路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借用毛泽东所运用的语言,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对毛泽东使用历史类比的作用进行一些有限的、尝试性的探讨,不属于对毛泽东个性的研究,也没有试图对毛泽东的心理进行全面分析。

对比国外对认知作用的传统研究,或者只强调类比的政策宣示作用,或者只关注类比的认知功能,对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类比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援引的类比不仅具有宣示和政策说明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反映毛泽东分析形势、把握环境、形成政策的认知思维过程作用以及影响毛泽东对政策结果的功能。将历史类比的政策宣示功能和认知功能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对类比作用不全面的观点。这种由于学科之不同而产生的关于类比作用的分歧,阻碍了对历史类比作用的全面把握,也许正是从这一点考虑,冷战结束以后才兴起的对外政策分析特别强调,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必须采取跨学科、多层次、多方法的综合视角。

如果从认知的角度考虑类比的作用,本研究基本支持国外有关历史类比作用的现有研究结论,即历史的类比能够帮助决策者理解和判断决策环境,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导。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撑了笔者关于将以西方(包括美国)对外政策实践为基础研究出来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运用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因为对外政策有其固有的共同特点,特别是在外交规范已经普遍化,全球化深入发展

的今天更是如此。以西方对外关系实践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提供了从不同角度分析对外政策现象的思路或地图,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特定现象,如认知模式和特点等以及它们与对外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途径,帮助对外政策的研究者自觉实现解释性推理的最大化。推而广之,对外政策分析的多种视角之间的结合还提供了从不同视角和层次分析和认识中国对外关系规律的多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加深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解。<sup>①</sup>

但是,由于类比都是以已知推未知,类比对象之间存在着共同性,也存在着差异性,如果推断的属性是共同性,那么结论可能正确,据此制定的政策也可能是合理的;反之,结论就是错误的。因此,推断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两个对象的共有属性和推出属性之间的联系程度,即共有属性是否就是推出属性存在的充分条件。<sup>②</sup>但由于历史是不会重复的,运用类比来提供政策指导也就具有了天然的风险性,错误使用类比以及根据错误类比制定政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决策者使用历史类比或运用历史所关注的,也是这类研究的核心。<sup>③</sup>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本文对毛泽东使用历史类比的准确程度和负面效果没有进行探讨。

此外,由于时间、篇幅以及我们自身能力的限制,本文只引用了《毛泽东外交文选》的相关材料,未能将有关毛泽东研究的更多材料纳入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稿》等材料纳入其中,毛泽东使用的类比可能更广泛。如果借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和途径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不仅能反映毛泽东的认知风格和特点及其整个政治决策的特点,也能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元素。国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还不多,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更长期、更深入的研究。这是本文的另一个意图。

[收稿日期: 2010 - 07 - 25]

[修回日期: 2010 - 09 - 03]

[责任编辑: 谭秀英]

① 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55-67页。

② 陶伯华:《试论类比推理的逻辑结构与认知功能》,载《求是学刊》,1984年第3期,第32页。

③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p 254-263.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143-190.

University

## A World of Plural and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Peter J. Katzenstein (45)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multiple strands of China's and America's civilizational traditions this paper develops its argument for a world of plural and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It also offers a pointed critique of unitary views of civilization. Clash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are the exception, intercivilizational encounters and transcivilizational engagements are the norm.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initic and American civilizations offer ample evidence for this proposition. Far from building a better and more diverse world,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in both West and East are seriously misguided in assuming that there exists on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by which we can judge our conduct and measure our progress in a world marked by multiple modernities.

**【Key Words】** plural and pluralistic civilizations, civilizational clash, civilizational convergence

**【Author】**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Walter S. Carpenter, J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USA, and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8–2009).

## Analogy, Cognition, and Mao Zedong's Foreign Policy

Zhang Qinglin Pan Lijun (54)

**【Abstract】**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is always hindered by the limitation of their cognitive capabilities, contextual uncertainty, as well as the overwhelming information they receive. Historical analogies are often drawn upon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environment and make policy decisions during the process. Based on the texts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the authors comb through and analyze the historical analogies that Mao used. They find that Mao shares with western leaders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using historical analogies. By employing the analytical and interpretation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analogies, the authors also find that historical analogies Mao used not only have the function of public rela-

tions in explaining and propagandizing foreign policies but help reveal Mao's cognitive process in analyzing environment and making foreign policy.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helps explain some details or subtle aspects of decision making despite its weaknesses;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cognitive study and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cognitive psycholog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Mao Zedong's diplomacy, China's foreign policy

**【Authors】** Zhang Qingin, Professor wit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Pan Lijun, Candidate for MA degree in Diplomatic Studies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 Option Generation and Selec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 Synthesized Approach

Yi Edward Yang Jonathan W. Keller (73)

**【Abstract】**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PH) posits a two-stag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which leaders first screen options in a non-compensatory fashion based on one (or a small number of) dimensions and then engage in a more r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remaining options. While devoting much attention to explaining how leaders evaluate options, PH theory does not focus on (a) how these options are generated or (b) how they acquire their relative attractiveness on key dimensions in the more "rational" second stage. We believe that the PH framework can be extended to account for the pre-stage-one generation and stage-two attractiveness of decision options by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the research program on foreign policy problem representation (PR) and image theory. P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way in which leaders define or frame the decision problem determines which policy options are generated as viable solutions and which options are not even considered. Image theory sheds light on the perceived likelihood of success an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viable options.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hybrid PR-PH framework and produce hypotheses about how specific elements of leaders' problem representations and strategic judgments related to their adversaries will affect the generation and 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y options.